

# 香港天主教會採取「開放門戶」態度

陳日君



(編者按：本文據英文公教報 *SUNDAY EXAMINER* 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所發表陳日君主教訪問稿翻譯，英文本曾刊於本刊第九十九期。本文蒙香港教區傳播處翻譯及授予版權，特此致謝。)

問：教廷於回歸在即時委任你為主教，有可能被視為是刻意要保護香港教區之舉。事實是否如此？

答：羅馬關心全球教會。湯主教和我本人明白有很多人以為這次任命是刻意安排，但事實上這是教會一向的正常運作。當主教將屆七十五歲時，教廷通常會委任一位助理主教。有些教區有四位至五位輔理主教。

問：你以為教廷對香港的未來和對將來任命香港主教有憂慮嗎？

答：我們從來沒有向羅馬明確地提出這個問題，但有可能他們會有些擔心。至於我們，對將來沒有真正的憂慮，因為基本法有清楚說明，一切

現狀保持不變。在國內政府會處理主教任命的事，但在香港不會有這樣做法。

問：你以為北京對控制國內宗教團體的發展和對教會的控制會伸延到香港嗎？北京會擔心香港教會可能對國內政策構成一種威脅嗎？

答：我相信政府當局對「開放」政策所引起的後果是有憂慮的，因為開放政策令當局越來越難控制一切。在香港關心國內教會的人也看得出有收緊的跡象，對我們到國內教書的人也實施了更嚴緊的規定。有很多跡象看出他們擔心有外來的干預。但問題是：我們（香港）的看法是很不同的，我們是同一的教會。我們合作、對話、互相幫助。不過我們也明白他們還是擔心的。

問：香港教會可以做些什麼去消除中國政府的恐懼呢？

答：我不知道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和國內的關係不是同政府交往而是同教會的人交往。我沒有機會與政府接觸。如果我有機會，我會向他們解釋

我們是同一的教會，我們要彼此幫助、溝通、交換，這是很正常的。但我相信政府當局有所恐懼，怕我們會干預。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教會與教會之間是一種兄弟的關係，我們不會干預國內的教會政策或教會組織。當然我們心裡是希望有一天他們會接受我們的制度，因為這是全球各地教會的制度。

問：你認為北京會容許香港繼續同時與地下教會和公開教會保持聯繫嗎？

答：在中國的情況是：法律是一回事，執行是另一回事，有時連政府也容忍一些不完全按法律而行的事，他們知道我們的做法並不是一種故意的挑釁，不過有時他們也禁止我們這樣做。

所謂同羅馬分離的「官方」教會不是實際的分離，他們同羅馬分離是由於政府不容許他們同羅馬接觸，但他們的内心同我們是一樣的，愛戴教宗。他們在等待著有一天能同整個教會聯繫在一起，所以我也認為我們幫助「官方」教會絕對不會感到尷尬，我們清楚知道我們並非幫助一個遠離羅馬的教會，

而是一個等待著回來的教會。我們把這訊息傳給國外的人，讓他們明白所謂分離是表面的。

問：在你的觀察中，地下教會和官方教會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呢？

答：地下教會和官方教會的關係各地不同，改變的方向也各異。但我倒想講講教廷對官方教會的態度。當我在一九八七年，初次到國內修院教書時，有規定我們不能同他們共祭，這項規定現時對自選的主教仍然生效，但對神父則不受規限，教廷現在容許我們與國內的神父共祭。神父對國內教會的現況無須負全責，但主教則不然，他們應該知道他們是不合教會法律的。青年人進入修院時，一心想做神父，他們不清楚實際情況，他們是無辜的，羅馬清楚他們的處境，甚至容許他們在不合法的主教手中領受鐸品。當他們出國時，只要確定他們宣認同一的信仰，便可以讓他們共祭。

問：有多位官方教會的主教會樂意來港參與你的晉牧禮，但未能成行，這會否被視為是一種對官

方教會的排斥？

答：我們對此不擔心，因為我們大家彼此很認識，我們是好朋友，有些官方教會的主教已經是合法化了，但我們不能公開這事實，所以即使他們能來香港，也不能參與共祭，他們很明白為什麼我們沒有邀請他們來。我們反而擔心政府會不高興，因為政府多次想辦法要國外的教會承認他們認可的主教和主教團，這次我們沒有邀請國內的主教，政府當局沒有作任何聲明，這是一個很友善的表示。

教務嗎？

答：有不少人會怕北京干預香港教會，但我們相信一國兩制這構思是有誠意為保持香港現況不變的。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別人的誠意，但是要了解不同的制度是不容易的，我們只擔心北京有時會不明白我們的制度，而在無意中干預及損害我們的制度。所以我們要盡力向他們表示我們相信他們的承諾，並幫助他們了解我們的制度。我們是在談論香

港教會，所以要清楚說明在香港是沒有宗教事務局的，既然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應有。有關香港教會

的事，我們會與特區政府磋商。但有關香港教會和國內教會的關係倒會有困難了。如果大家強調一國兩制，他們可以說「好吧！我們尊重你們的制度，你們也要尊重我們的制度。」這樣，當國內有迫害

教會的情況出現，例如有某地方主教神父被當局拘捕，甚至有神父被拷打，我們要怎樣做？我們不可能保持緘默，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弟兄，但如果我們發言呢？北京可以說：「你們干預我們的制度。」我們會處於很困難的情況。

問：你個人，胡樞機，湯主教會否同宗教局會面？你們會否同新華社經常接觸？

答：我相信新華社可以是一個通道，方便我們為國內教會服務，我們希望打開這通道，藉對話達成共識，弄清楚什麼是干預，什麼是正常的聯繫。如果有機會直接和中央領導對話，那更好了。

問：你以為香港教會會捲入中梵的複雜關係中

嗎？

答：問題不在梵蒂岡與香港教會，而是梵蒂岡與國內教會，我相信梵蒂岡不介意我們（香港教會）有時不出來為她說話，梵蒂岡有很多渠道可以發言的，不過有時候我們也有必要說些中國政府不喜歡聽的話。

問：如果你被迫要批評中國政府，怕不怕會危害香港教會的處境？

答：這不應該為香港教會帶來困難，假如我說了些有關國內教會而令中國政府不高興的話，他們可以在報章上指責我，不讓我到國內去，但他們不可能傷害教會，因為在香港我們有香港的法律。

問：有些外國傳教士恐怕北京會取消他們在香港工作的權利，你會如何安撫他們？

答：我看不出在短期內會有任何威脅，在香港有很多外國人士，入境條例仍是開放的，很多傳教士目前擁有「無條件居留權」，除非有根本性的大變動，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我們會對政府說，傳

教士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需要他們，中國人愛護他們。

問：你認為香港教會同國際的連繫是一種力量或是一種弱點？

答：我認為是一種力量，我想北京會三思才決定採取任何有損香港教會的行動，教會是世界性的。

問：你希望如何改善香港教會和國內教會的關係？

答：我們希望能夠做很多的事，但七月一日後的情況未必有所改善，可能會比現在更困難，因為在過去兩年期間，已有收緊的現象，我們仍然等著國內的年青神父來香港修院進修，但至今他們仍未獲得批准，北京也沒有解釋理由。是政策改變了。以前我們知道為什麼不批准，因為北京視香港為顛覆基地。後來有兩位修生和一位由福建來的神父獲准來香港修院就讀，我們以為再沒有問題了，我們就特別為從國內來港進修的神父編制了課程，但是現在他們又不獲准來港，我認為改善這方面的情況

是很重要的。

問：你以為北京會藉著香港去改善同梵蒂岡和同外界的關係嗎？

答：對這問題我不知答案。倒不如讓我在談

談「橋樑教會」的問題。「橋樑教會」一詞是教宗接見台灣主教時說的，我們在香港認為作為「橋樑教會」，台灣的距離是太遠了，香港更合適去作橋樑。作什麼橋樑？是要作中國教會與全球教會之間的橋樑，我們最有機會作橋樑，因為我們可以到國內去，我們也是全球教會的一分子。

其次我們知道在國內也需要橋樑去連接官方教會和地下教會，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幫忙了很多。很多到國內去的人在這方面沒有作出幫助，他們有些支持官方教會，有些支持地下教會，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如果香港人到國內去要真正幫助他們的，就要使雙方彼此諒解，不要對立，因為我們都是弟兄。

問：有人指責香港教會向北京屈服，出賣了被

迫害的教會，你如何作答？

答：我認為只有很少數的人會這樣說，有時這種指責是來自國外的人，在國內一般來說，地下教會消息靈通，他們漸漸了解實際情況。反而是外面的人有時很固執，不肯接受我們是同一教會的事實。

問：你以為香港教會需要證明它是愛國的嗎？

答：這種說法令我惱怒，一方面我們當然愛國，這是明顯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要尊重有些人的感受，你不能強迫別人去愛，愛國就是愛自己國家，但這國家是共產政權的國家，你可以強迫別人去愛共產政權嗎？面對七一政權交接的日子，我以為我們不必以消極的態度去傷害香港人的感受，我們應該高興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我們不能強迫所有人都大事慶祝，我們一方面高興，一方面有憂慮，我們應尊重大多數人的感受。為表達回歸，當日會有隆重的感恩祭，由三位主教主禮，除此以外，我們沒有其他的慶祝，我們會參與政府邀請的儀式，但我以為不需要有其他的活動。

問：對那些過去曾經在共黨權下受過苦而逃離中國的教友，和那些害怕再受迫害而想離開香港的教友，你會怎樣安撫他們？

答：有些神父叫教友不要離開香港，這種做法我可以接受，但有些神父說離開香港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我認為錯了，因為你要尊重別人的決定，有些人是害怕的，最終只有他們自己才可以決定去留。我們肯定現在的制度真的五十年不變嗎？我不是百分百的肯定，我不知可否有百分之九十的肯定，我鼓勵人留在香港，對他們說：「我肯定留下。」但是有些年老的中國神父，因為有過去的經驗，他們沒有安全感，就讓他們離去吧，為什麼要阻止他們？世界這麼大，尤其是修會的會士，他們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有很多地方的中國教友需要神父，就讓他們去服務吧！

問：為什麼北京當局要怕教會？

答：我以為他們不明白天主教對社會安定是很貢獻的，我聽說上海曾作過調查，發現有大多數

教友的鄉村，犯罪率是很低的，正因如此，上海當局准許為嬰兒付洗。不過共產黨要控制一切，他們知道有信仰的人，是比較難加以控制的，所以他們怕教會。

問：為什麼國內當局不容許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政治事務，但卻容許香港教會繼續辦學，並在社會政治事務上有自己的立場呢？

答：國內官方教會的活動，只限於宗教和精神方面的，他們也從事些社會服務，例如辦小型的醫院及一些訓練課程，至於辦學……就很困難了，在國內辦學是不獲批准的，因為在學校裡你可以灌輸某些理念，北京對這方面是很害怕的。在香港我們可以繼續辦學，這是基於「一國兩制」。鄧小平非常聰明，這樣可以令香港繼續有利於中國。當然在香港可以被容忍的方式是不容許在國內實行的。

問：教會的社會行動組織，例如正義和平委員會，可以被視為越過了宗教的範圍，是一個政治組織，有可能被禁止繼續活動，你對這點有憂慮嗎？

答：沒有，正義和平委員會根本不是政治組織。即使被認為是一個政治組織，他們也應該可以繼續活動，因為在香港政治組織是可以存在的。北京很難明白我們對民主的看法，很多次在國內和新華社的朋友對我說：「為什麼主教容許他們在我們的門前抗議？」我們的回答是：「主教是不能做些什麼的，他們是成熟的人，他們有權利，主教不能說不要去！」中方不明白這種做法並不是一種威脅。至於民主的理念，我們要辨別清楚，一方面民主是對於每個人的尊重，另一方面民主是普選權，一人一票。民主精神要從基本做起，我的意思是，先要尊重每個人，尊重人的自由，然後才可以建立制度，改善制度，使制度更成熟。我認為香港人對民主相當成熟，因為香港人有良好的基本的全面教育。

問：你對前景有希望嗎？

答：雖然我們在香港對國內教會要負起很大的責任，雖然我的個性較偏向悲觀，但我對香港和中國教會前景是樂觀的。

□